

02

津西古今采珍

方紀年



津西古今采珍

方紀年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天津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津西古今采珍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市西青区政协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静海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frac{3}{8}$ 字数 21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06-1287-5/I·1183 定价:6.80 元

序

何 国 模

以杨柳青为代表的津西地区，是天津人杰地灵的地方。早在天津设卫之前，杨柳青就因漕运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津西一带繁盛之地。驰名中外的杨柳青年画，名扬四海的武林大侠霍元甲，勇闯新疆赶大营的杨柳青商帮等等，都在津西历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页，为津西地区增添了照人的光彩。

《津西古今采珍》一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反映了津西地区的发展变化，展现了津西一带淳厚的风土人情。如书中记述的毛主席、周总理视察津西的情况，再现了当年的珍贵历史场面，读之感入至深，印象深刻。再如书中有关“赶大营”的史料，不仅记述了杨柳青人赶大营、开发新疆的前后经过，而且通过大量生动的史实，表现了赶大营商帮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历程，也展现了边疆地区的生活风情。“赶大营”作为一种商业贸易活动，可以说它是一条由沿海到中亚的新的“丝绸之路”，也是较早的“欧亚大陆桥”，它把沿海与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贸易活动，不仅繁荣了内地经济，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象杨柳青年画、河北梆子等等，正是通过“赶大营”传到了西北各地，甚至走出国门，传到中亚一带。因此，“赶大营”的史料对今天来讲仍有值得深思和借鉴之处。

此外，本书中一些反映改革开放后津西新貌的文章，也有史料价值。这些文章以生动的事实展现了津西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精神面貌，通过这些史料，人们可以看出改革开

放给津西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有更具体的了解。

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几年来在征集、编辑、出版本区历史文化史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本区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正是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这本《津西古今采珍》才能得以顺利编辑出版。虽然全书文字不多,但已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津西地区古今概貌,使读者大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感。这本书是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全体同志多年来辛勤工作的结晶,他们所做的工作,有益今人,惠及后人,功不可没。

这本书所选录的史料,不仅有鉴往知今的作用,而且这本书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西青区,宣传西青区,使西青区的名字更加响亮。西青区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传统,在加速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今天,愿西青区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愿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更好地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目 录

序	何国樸(1)
毛主席在王顶堤	刘广泰 边均兴(1)
毛主席视察蛤蟆洼	郭发科(3)
周恩来总理视察杨柳青画店	邢富贵(7)
天津商帮“赶大营”始末	王鸿逵 于焕文 谢玉明(9)
三赶“西大营”	王新舫 王鸿逵(43)
赶大营的首创者安文忠	王新舫 王鸿逵(53)
赶大营的路单和“大篷车”	阿 明(58)
天津商帮在新疆	王鸿逵 于焕文 谢玉明(63)
名扬四海的杨柳青年画	王鸿逵(90)
杨柳青年画小史	马逸先(95)
杨柳青南三十六村画业兴衰小记	张茂之(103)
精美的杨柳青剪纸	王开元(116)
津门大侠霍元甲	张鸾 谢玉明(120)
霍东阁的一生	王洪海(127)
精武风云八十载	谢玉明(135)

7c60/p

霍氏练手拳 阿 明(151)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 阿 明(155)

“一二·九”运动期间天津学生在津西农村

办“义教”纪实 石泽年(158)

杨柳青“八大家”轶史 王子羽(163)

杨柳青石氏家族兴衰录 于焕文 王鸿逵(173)

杨柳青的来历 旧 燕(204)

漫话杨柳青的民间花会 旧 燕(208)

旧时杨柳青的婚丧喜寿 喻 叟(213)

杨柳青的旧水局 王子羽(224)

小南河纪事 晨曲 国成(229)

飘洋过海的硫化青 于焕文 彭巧(238)

津驾实验学校创业记 杨书森(246)

飞跃发展中的天津市微型汽车厂 张茂之(256)

后 记 于焕文(262)

毛主席在王顶堤

刘广泰 边均兴

天津市西郊区西营门乡王顶堤村，位于市郊西南，与南开区交界，背靠津西大洼。这个村农副渔并举，是一个为城市服务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解放前，这里地势低洼盐碱，非旱则涝，灾害连年。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说：“卫南洼，不当家，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1949年1月天津解放，王顶堤村的人民获得了新生。在村党支部和村公所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道路，先后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1955年秋季，王顶堤村根据上级党委的要求，积极筹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于1956年1月12日视察了王顶堤村。

1956年1月12日上午10时，毛主席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西郊区委书记高翼飞等陪同，乘汽车来到王顶堤村。同来的还有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罗瑞卿、邓子恢、林铁、周小舟等，还有天津市南郊区的李吉顺同志。

毛主席下车后，黄火青将邓秀俭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王顶堤村支部书记。”毛主席热情地同邓秀俭握手，同时说：“我们来看看。”毛主席边走边问邓秀俭：“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地？”邓秀俭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问：“你多大了？”邓秀俭答：“25岁。”毛主席又问：“搞合作社有困难吗？”邓秀俭答：“没有困难，就是富裕中农不愿入社。”毛主席听后笑了。

来到村公所办公室的里屋，邓秀俭请毛主席坐下。这时毛主席

拿出烟来让大家吸烟。当时被召见的还有李吉顺、徐茂起(村长)、陈玉来(村团支部书记)。毛主席说：“我来看看合作社，你们有什么困难。”邓秀俭回答：“贫下中农都愿入社，现在产量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群众生活好了，就是富裕中农不愿入社。”毛主席问：“为什么？”邓秀俭说：“他们的土地好，劳力多，农具齐全，入了社怕吃亏。”这时，村妇女主任徐茂芬进来了，邓秀俭向毛主席做了介绍，毛主席同她握手。毛主席风趣地问：“你领导老太婆行吗？”(当时徐茂芬只20多岁)徐茂芬说：“能行。”毛主席又问：“识字吗？能看报吗？”徐茂芬说：“刚上识字班，可以看报。”毛主席又指着站在门边的杨起发问：“你领导什么？”杨起发说：“我管生产。”毛主席同他握握手。又指身旁的徐茂起说：“他负责什么？”邓秀俭介绍说：“他是村长，他旁边的陈玉来是村团支部书记。”毛主席说：“好！你们这是农村五大领袖。”

之后，南郊区白塘口村支部书记李吉顺向毛主席汇报了他们那里合作社的情况。

毛主席走时，邓秀俭把毛主席的帽子送过去，毛主席说：“谢谢你。”毛主席走在村中，看到路两旁的摊贩，还询问了他们卖的什么。毛主席上车前，群众围在外面，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几次招手示意，而后离去。

毛主席的视察，给王顶堤村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以极大鼓舞和力量，坚定了全村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当天，家家户户吃喜面，以示庆祝。当晚，全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党、团员、贫下中农纷纷表示办大社的决心。17户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也全部报名入社。1956年1月15日王顶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宣告成立，天津市歌舞团、曲艺团到会演出，庆祝活动持续数天。

高级社的建立，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干部思想坚定，社员情绪稳定，生产年年发展，社员收入逐年增加，全社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毛主席视察蛤蟆洼

郭 发 科

1958年10月西郊区与南开区合并后，我任中共南开区委农村工作部长，当时南开区委书记是张寅同志，管农业的书记是高翼飞同志，管农业的副区长是韦思襄同志。1959年9月18日区委接到市委通知：明天上午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你区津西公社水稻生长情况。当天下午区委商议后，由我带着几个同志协同公社的同志去蛤蟆洼稻地选了几个参观点。这几个点都在天津去杨柳青的公路边上，因为路与地之间有沟，我们又到邻村大下庄找了一部分木板，在这几个点的沟上架了木桥。

第二天就是9月19日，这天天气晴朗，还很凉爽，南开区的主要领导有书记张寅、副书记高翼飞、副区长韦思襄、区委办公室主任张永三、公安局长马连理和我们农村工作部、农林局的同志8点以前就赶到了赵庄子村北稻地第一个参观点。上午9点来钟，车队来了，在我面前停车的是第二辆车，这个车上第一个下车的就是毛主席，我赶紧向前走了两步，向毛主席问好，并和毛主席握手。这时市委书记赵克同志也下车了，把几个领导同志介绍给毛主席，并都一一握了手。然后我搀扶着毛主席过了跳板，在稻地里看稻子的生长情况。这时的稻子正是发墩的时候，每墩都在10棵左右，还没有秀穗，长势特别整齐好看，毛主席看到地里的水很少时说：“怎么地里没有什么水呢？”我说：“上午给西片上水，下午就给东片上水。”又问：“这稻子能产多少？”我说：“能收七八百斤，好的能收一千

斤！”毛主席听了点点头。正在这时候赵庄子出来十几个人，一边走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站起来摆手示意，不要人们喊了。我看毛主席不让喊，就顺着地埂迎去，一看是赵庄子村妇联主任李风英同志带着十几个妇女来看毛主席，我把她们领到毛主席跟前，把李风英同志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和李风英同志握手说：“好，你们这是半边天哪！”大家哈哈大笑。这时赵克同志说：“另看一个地方吧。”

第二个点是大卞庄子地段，毛主席下车后，向西、向南一看是一大片稻田，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啊？这片稻田不小啊！”这时大卞庄子的村干部说：“这是蛤蟆洼。”毛主席问：“为什么叫蛤蟆洼呢？”村干部们说：“这个地方是洼底，下点雨就存水，群众就叫它蛤蟆洼。过去这里种高粱，洼底种点麻，十年九不收，这二年才开始按着方田挖沟种稻子。”毛主席说：“好啊！洼地种稻能增产。”毛主席看到南边长着很高很密的林带时就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是南运河大堤。”毛主席说：“是南北运粮河吗？”我说：“是。”赵克同志扶着毛主席过了木桥，在稻地里察看，毛主席弯着腰看每墩稻子株数，看水的深度，说：“这水大小？”我说“正好。”（当时水的深度三指左右）毛主席说：“这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说：“去年在南运河上修建了扬水站，这是南运河的水。”这时候由天津开向杨柳青的火车正在这里经过，毛主席说：“这是什么路？”众人说：“是津浦路。”毛主席点点头，并问路那边（指路北）是什么地方？我说：“那边是杨柳青农场。”毛主席说：“到那边看看去。”原来计划在西边曹庄子村北还有一个参观点，这样就去不了了。

杨柳青农场安排了两个点，一个是稻田点，一个是园田点。过了铁路第一个点就是看稻田，因为在场的人没有杨柳青农场的人，就派一个车到场部去接赵一农同志。我们大家到了参观点后，赵一农同志随后也赶到了。他和毛主席握了手，毛主席就问杨柳青农场的情况：农场有多少土地？都种些什么作物？收成怎样？有多少职

工及职工的收入情况等，赵一农同志都一一作了回答。这时跟随毛主席的一个女摄影师，站在稻田埂上要给大家照像，她刚向后一退，不小心一只脚踩进了稻田子里，一歪差点倒下，这时毛主席看到说：“真勇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正在人们大笑的时候，“咔嚓”一声把这个场面照上了，第二天这张照片就登在了《天津日报》上。随后赵一农同志就搀扶着毛主席过了木桥去看稻田，看完稻田回来时，毛主席看到铁道沟子里长着好多苇子，就问：“那是长的什么呀？”赵克同志说：“是自然生长的芦苇，一般做烧柴，好的可以打苇箔，细杆的可以做苇帘，还有一种人工栽种的，可用来织席，白洋淀的席苇就是人工栽种的！”毛主席听了点点头。

接着又上车去看园田，这园田是旱田改种的，大白菜刚定棵。毛主席在菜地里走出几十米远，这时天已快11点了，毛主席走热了，把外衣脱下来交给随行人员。毛主席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衬衣，看上去非常健康，当走到一个有几间土坯房的地方，就隔着窗户向里边看，并问赵一农同志，里边放的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赵一农同志说里边放的是农具、化肥等。毛主席看到外边有个草垛就问赵一农：“这是什么？”赵说：“这是冬天苦韭菜用的草苫子。”毛主席点点头，就开始向回走，当看到白菜畦里有一棵白菜长在畦埂子上了，毛主席风趣地说：“哈！它怎么长在这里，你闹独立性吧！”大家都笑了。当走到停车的地方，大家看毛主席累了，就劝他老人家到农场场部休息休息，喝点水，吃顿便饭，但是毛主席没去，说是回去，这时和在场的人都一一地握了手后，就上车回市里去了。

当时我们大家的心情都愿意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话，喝点水，吃顿便饭，遗憾的是未能如愿。杨柳青农场党委副书记、老红军刘福来同志听说毛主席要来视察杨柳青农场，心情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早晨早早就起来洗漱刮脸，把平时舍不得穿的好衣服穿上，等着见毛主席，可是毛主席没有到场部去，老刘同志后悔极了，责怪自己为什么总在场部傻等着呢？要是到地里去见毛主席多好啊！

还有公社干部冯文光同志，原计划毛主席要到曹庄子村北稻地视察，地点也选好了，路也修好了，他带领曹庄子的干部在地里等着，结果毛主席没有去，他们也很后悔没有到大卞庄子地里去迎接毛主席。

第二天我们农村工作部和公社的同志在一起回忆、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说的“洼地种稻能增产”。津西公社的蛤蟆洼过去多年来种旱田，总是十年九不收，下30毫米的雨，蛤蟆洼就泡汤了，就是种高粱有的年头也不能收。经过挖沟修渠、平整土地，又建了扬水站，改种稻田，每亩能收六七百斤稻谷，多的能收到一千斤。

因为毛主席视察津西的时间是1959年9月19日，后来津西公社就改为“九一九公社”了，杨柳青农场也改为“九一九农场”，后来又都按着地名改过来了。

周恩来总理视察杨柳青画店

邢·富·贵

1960年正月初二，虽然在严冬季节里，但天气却显得格外暖和，整洁的杨柳青画店大院更仿佛是进入了春天，全体干部职工象小孩子盼待过年似的，期待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的鸣叫，10辆轿车缓缓地开到画店门前，车门启开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原静海县曹县长、杨柳青镇申书记及画店刘增瑞经理的陪同下，步入展室，参观了年画展品，然后又到车间参观。在彩绘车间里周总理看到70多岁的张兴泽老艺人时，马上走上前与老艺人握手交谈，向老艺人问好。总理问：“您今年多大岁数啦？”张兴泽回答：“72岁啦！”总理问：“生活怎么样啊？”张兴泽回答：“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解放前我们这些穷画面的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解放后党和政府救了我，我打了一辈子的光棍，现在组织上给我成了家，每月工资100多元，吃穿不愁啦！”总理又问：“您现在教了几个学生？”张兴泽回答：“只4个徒弟。”周总理转过头来对刘经理说：“要继承发展民间艺术事业，要培养接班人哪！”周总理又问刘经理：“你们有什么困难？”刘说：“目前有一种颜料买不到。”总理马上问：“什么颜料？”刘经理说：“藤黄。”总理说：“我回京后给你们想办法。”

周总理在彩绘车间参观时，对艺人们的技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其中两张年画十分赞赏，刘经理随即把总理喜欢的那两张年画包装好送给周总理留念，但总理执意不要。参观后，周总理向

同志们招手告别。周总理参观杨柳青画店虽然时间短暂，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印在了人们心里，时时浮现在人们眼前。

周总理回京后不久，画店就收到了周总理寄来的藤黄颜料。画店收到颜料，全体职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事情虽小，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都记在心里，并及时给予解决，这不仅是周总理对杨柳青年画的关心，也是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整个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关怀。

天津商帮“赶大营”始末

王鸿逵 于焕文 谢玉明

、引 言

“赶大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纷纭万象和绚丽多彩的奇迹。它编织了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然而它确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远在120年前的清朝同治年间，因派遣钦差大臣左宗棠用兵新疆，诱使天津杨柳青人兴起的随军商贩活动，伴随左帅10多年的征尘岁月，竟发展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天津商帮。

清军进兵新疆一带的营幕称为“西大营”，杨柳青人跟随进军路线沿途肩挑小簍做生意，称为“赶大营”。在新疆平定之后，天津商帮已在新疆构成财力雄厚的商业网络，再去新疆的后继之人，则称“上西大营”。凡在新疆发财还乡的人，在杨柳青地区称为“大营客”。

天津商帮的新疆之旅，经历了三四代人，直到民国初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乃至“七七”抗战爆发，再上西大营之人基本绝迹，从此为天津商帮赶大营，在历史上划了一个句号。

“赶大营”之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促进了新疆地域商业经济的开发，沟通了渤海之滨与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了民族感情。在“赶大营”辗转途经的陕、甘和内蒙、宁夏等地，也产生了相应的作用。“赶大营”的足迹还涉及河北、山西、黑龙江和当年

的外蒙古，及至越过北国边陲之外的俄境。

至今，因为当年“赶大营”而滞留和旅居新疆的天津商帮及其后裔，约有数千户，达一万多人，其中以杨柳青人为最，分布在全疆各埠，尤以乌鲁木齐较为集中，该城历有杨柳青人集居的街市。

“赶大营”的缘起

清穆宗同治年间，由于西北地区乱军割据和民族争纷引起的政局混乱，始于陕西，延至甘肃，进而扩大到新疆，严重地威胁和动摇着大清王朝的统治。同治五年朝廷任命汉人出身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同时授以钦差大臣头衔，负责督办陕甘军务，剿肃捻军（西捻）和平定乱局。

左宗棠调动了大约 12 万军队，从同治六年六月进驻潼关，到光绪六年十二月离兰州，除去在东方剿捻的一个时期外，他在西北用兵 12 年零 8 个月，天津商帮杨柳青人的“赶大营”活动，主要是在这 10 多年间兴起的。

诱使杨柳青人“赶大营”，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洋商的轮船在我国的沿海及各通商口岸横冲直闯，并逐步控制和替代了内河航运。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库开支严重不足，无力顾及内河的治理维修，致使许多河道淤塞不畅，复又增加苛捐杂税（主要是各种厘捐），设关立卡，沿途敲诈勒索，素以水运业发达的杨柳青镇，随着养船户的逐年亏累，大批船工失业。邻近各县镇及当地的连年旱涝灾荒，致使粮价腾贵，市面萧条，破产者、失业者日增，迫使大批劳力陆续外流谋生，恰逢左宗棠用兵西北，于是杨柳青人便闯出了远贺新疆的一条生路。